

文学翻译基本问题

袁筱一 邹东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基本问题/袁筱一,邹东来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149-4
I. ①文… II. ①袁… ②邹… III. ①文学翻译-研
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9429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张志全

文学翻译基本问题

袁筱一 邹东来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插页 4 字数 177,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49-4/I·923

定价 32.00 元

不在场证明

——代序

—

这本身就是翻译当中逢到的词：砖头一样厚的《多米尼克·奥利传》里，曾经声名显赫的女权主义者、历史学家埃迪特·托马斯在怀疑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天赋时，埋首于对历史人物波利娜·罗兰的研究。她说，这项研究是她的“不在场证明”——alibi，这个法律上的名词所包含的意思就在于，躲在另一个人的身后，说自己想说的话，爱自己想爱的人，唾弃自己想唾弃的世界，以不在场的形式宣告在场，或者说，用另一种身份主宰灵魂，而先前的一个自己可以安然抽身，举证说：“瞧，当时在场的不是我。”

觉得它是用来形容翻译的最好术语（建构过去的历史研究何尝不是广义上的翻译呢？）：牵连和撇清同样都是最高意义上的。倘若是对灵魂没有把握的人，比如我，翻译可以为他提供最安全的怀抱。这是纯私人的，做翻译的理由：它可以缓解灵魂的寂寞，可以缓解赤裸裸的灵魂直接撞上尖锐的语言之墙所产生的疼痛和焦虑。就像 2008 年夏天，在所有的惶惑与恍惚里，唯有多米尼克·奥利——当然，我相信是我笔下生成的那个多米尼克·奥利——是最能够触摸到的安慰与镇静剂。更有一份惊喜是，这位色情小说《O 的故事》的匿名作者除了法

国伽里玛出版社审稿人、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以外,也是翻译家。甚至在我重读当年法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翻译理论博士论文《翻译的理论问题》时,竟意外地发现了她为语言学家乔治·穆南写的序言。在序言里,一向喜欢匿名游戏的她却要为翻译正名,很严肃地说,要还译者一个明朗的身份,再也不能让他/她的名字以小一号的字体躲在作者背后。

乔治·穆南的博士论文写于20世纪60年代。也正是从60年代开始,法国以及法国之外(包括中国)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纷纷发现翻译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块可以滋生很多情绪、悖论、理念的领土:理解、道德、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构成,自我与他者,等等。很华丽,也很丰富。而在此之前,像多米尼克·奥利这样的翻译家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商人为文人提供的休假别墅的小花园,和纪德前辈探讨英法翻译中的实际问题。小花园很安静,因为头天夜里的香艸让大多数作家在上午起不了床。他们不讨论理论,只讨论技巧。除此之外,乖巧的多米尼克就为纪德前辈排忧解难——倒不是抱怨译者的稿酬低,也不是为了译者争取大一号的名字,而是纪德的女秘书让他不堪其扰,可偏偏纪德喜欢的又是男人。纪德前辈所呈现的尴尬也有点和译者的尴尬相类似:有时候哭着喊着要去喜欢一本出发语的作品,人家却是没有正眼瞧过你。

现在的翻译界自然是有些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概念、术语和理论问题,因为除了做翻译的人谈论翻译之外,有些不做翻译的理论家也在谈论翻译,例如德里达。这就让翻译的重要性得到论证。只是翻译的在场与理论的在场毕竟是两回事,理论没有闲情逸致躲进小花园,

也不可能安然地流连于牵连和撇清之间的悖论——尽管这悖论对热衷于泡在别人的酒瓶里把玩自己灵魂的译者来说可以是那样美妙。理论有它截然的一面，像多米尼克一样，为理论写序时甚至需要破除自己匿名的游戏。它不允许模糊和暧昧，在赞同某一种现象时就要反对另一种现象。

于是这些年，理论的产生仿佛只是让翻译多了争吵的声音，并没有太多物质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样的奇异景象应该只属于翻译：之前的很多年里，翻译自顾自地进行着，不论遭到怎样的嘲笑、指责与抱怨，不论怎样的说不清楚；好不容易等来了理论上可以论证的重要性，它依然要遭到嘲笑、指责与抱怨，并且依然说不清楚。就好像无论哲学从哪个角度来回答生活的问题，卷入得再怎么深，包含得再怎么广，也无益于个体在实践自身的存在时能够从容应对。个体的翻译实践或许不需要理论来指导，只要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法律对它的规定。我们对翻译的指责往往就是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法律对于胆敢冒犯这一切的翻译的指责，因为翻译从其“异”的本质而言总是既定时代既定语域里的另类，处理得不够圆通自然会显得非常显眼，远比蹩脚的创作要显眼的多，所以要遭到非议，甚至会被淘汰出局。

那么又为什么还要做理论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理论家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实践家——都想要争取参与制定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这是一种以固定的、可见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方法。或者，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生产历史存在的方式。它能够把游戏铸造为历史中的事件，也能把小花园中的场景变成瓜分话语权的学术会议。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倒是为什么还要做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成了问

题。名和利一定是与翻译无缘了的,那么剩下的也只有灵魂了。然而,不在场证明的游戏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游戏,只要你是——这也应该是翻译通行不变的标准——放了灵魂进去的,只要你是在准备生产一颗全新的灵魂。我倒是很乐意去想,译者所能得到的奖赏或许在于,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的小花园里,也可以和纪德前辈讨论一下翻译的问题。

二

我却是在实践之外也做一点理论的人,并且很早就体会到理论中的“痛,并快乐着”。早在翻译理论还是让大部分人感到怀疑的一个词的时候。是的,我们可以不怀疑哲学、文学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美学的存在,但是我们怀疑翻译理论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性。

我不怀疑人们的怀疑,因为我也是从这样的怀疑过来,并且至今仍然有所怀疑——特别是在谈“翻译科学”的时候。然而这并不妨碍我满心喜欢地投入这场思维游戏。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翻译理论是为了解决翻译的问题而存在的。在我看来,不以真理颐指气使的面孔出现,而只是不断地提问,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卷入,这足以证明翻译理论存在的必要。它和所有的理论一样,都不回答具体而微的问题,不会成为我们在为物质所困时的一根救命稻草。它最终能够提供的,也不过是我们用语言的方式理解世界时一个别样的角度而已。用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这篇文章中的根本出发点而言,就是关于“语言的形而上问题”的。的确,翻译理论研究和和其他理论研究之间的差

异并不是那么大。任何领域的理论——无论是否成为学科——都是从对理想的向往开始的，也都是从对理想发生怀疑的那一刻起发展的。千年的理论差异，倒或许是因为翻译实际得让人很难和理想——从而和形而上的东西——挂钩，因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为自己辟出一块理论的领地，用理论家们的话来说，就是一直停留在“手工作业的经验主义状态”中。

翻译真的是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味。有了原文本的依托，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译文本永远难以坠入意义的虚无——换了德里达的术语，就是永远也不会延搁在能指上。因为要破解，所以不能玩味，所以要找到那个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整体。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敢下决心去纠结的。我始终认为，如果理论可以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纠结，哪怕被物质的条条框框磕碰得再疼，也有活生生的细节托着你，这样就不至于惶恐。否则，意义的建构要用上数十个世纪，消解却可以就在举手投足的一瞬间。

实践的烟火气味自然也要作用到理论上：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的是，翻译理论研究在它的科学化之初就不能够像其他形而上的问题那样可以和实践撇清。它与曾经试图容纳它，并且几乎可以达到形而上顶点的语言学不同。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乔治·穆南上来就说，“翻译的存在是现代语言学的丑闻”。“丑闻”这个词怎么看怎么有点触目惊心，它比不在场证明要严重很多——因为上升到了理论的层面。在语言学的鼎盛时代，为无所不包的语言学制造“丑闻”：这样的理论开端真的是很具戏剧性。当然乔治·穆南要说的道理也很浅显：翻译只要用它强大的、沉默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把现代语言学堵在死胡

同里,谁叫现代语言学在理论的封闭游戏里可以兀自推导出翻译是不可能的结论呢?

于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件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在于努力促成这桩丑闻在纯理论的推导下也可以成立,也可以存在,哪怕这样的存在本质上仍然是悖论性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关系也许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个比喻里:一个是暗自偷笑的不在场证明游戏;一个却是在努力证明自身的可能性,证明那个既不完全是自己也不完全是他者的在场也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费尽了心机要将那个躲躲闪闪的主体抓出来,予以定义。

三

《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一部分思考来源于十年前的博士论文。而在此之前所经历的提问、否定和卷入的漫长过程,导致了我在博士论文结束之后终于有一次大的爆发和为时不短的理论出走。殊不知,理论的世界也是可以用来逃避的。

我想说明的是从1998年开始到2005年间个人的一段空白。我当然不是自恋到要阐述这段空白与我的理论进程之间的关系。像我这样一个一开始就选择把翻译理论当成情绪自留地来耕种的人,空白也不过是农民式的中断和休息。但是这段空白和我在这本小册子中的理论立场有关。

2005年,因为回到讲台,作为尝试,我为外语学院翻译理论方向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课程,这门课于是成了我结

束空白最直接的原因。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这一次重建记忆的过程仍然纯粹和投入,带有初涉理论者的好奇和沉迷——可能正是因为有过一段空白的缘故吧,不同的只是能够在即将坠入文字世界无边的黑暗之前有一个深呼吸的动作,“假设”另一个自己的存在,并且以自己的一切力量推动她的所有思想实验。

在这个基础上,我才敢给十年前暂告一段落的思考一个交待。虽然,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在近些年也许已经丰富得不再需要这么一本讲述“基本问题”的小册子。

十几年前,国内的翻译理论界还是才开始热闹的时候。关于翻译的争论很多,也都理想主义。中国的理论家们因为注意到了西方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翻译理论自身所产生的系统化、科学化的要求,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也应该对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有所启示,于是纷纷开始借用西方的理论术语和方法——尤其是语言(哲)学的术语和方法——来探讨翻译的问题。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带入翻译的理论思考,在我第一个阶段的书单里,乔治·穆南、乔治·斯坦纳、安托万·贝尔曼、拉德米拉尔、亨利·梅肖尼克、塞莱斯科维奇等占据了大部分的位置。而除了他们之外,他们赖以存在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现代诗学和现代文学理论也是我了解的重点之一。

在我第一阶段的思考中,真正感到困惑的,是翻译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否普遍适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是一个“语言决定论”者,相信语言是我们在世的居所,而非“手段”或“方法”。并且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出于这个原因,作为语言聚合现象的翻译在我看来才有深入思考的必要,因为它在语言的本质之外,还

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这就让这个居所显得更加华丽。世界因为语言被梳理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秩序,于是,基于两种语言系统之上的翻译研究除了试图建立秩序以外,还可以对因此变得复杂起来的关系做出说明。在我的理解中,它虽然在当代的理论环境中刚刚得以建构,带有现代性自相矛盾的种种印记,却应该能够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本质(哪怕是悖论性的)做点什么。然而大多数翻译理论家——不论他们是否做实践,不论他们是否有建构“翻译学科”的野心——所期待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事情,他们依然想用别的方法(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断章取义的别的方法的论断)试图对翻译的问题有所回答,并且止步于“应该与不应该”的价值判断。

在我的空白时期,是国内翻译理论界轰轰烈烈进入“后殖民”和“后现代”的时期。德里达、保罗·德曼这样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还有诸如斯皮瓦克、巴斯内特这些会探讨更加具体的翻译问题的理论家们。这里的时间差有些令我始料不及。十多年前,我收集博士论文的资料时,也曾和德里达耳鬓厮磨过。但是德里达在我眼里始终不是一个翻译理论家,他谈及翻译从来只是将之当作语言的现象之一来对待的——而语言才是他真正关注的对象,从而也是他真正切入哲学的途径。德里达再怎么具有破坏性,他其实并没有摆脱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他再怎么关照翻译的问题,说到底也从来没有将翻译当成一个根本的理论阐述目标来对待。

然而有一个哲学家却是做翻译研究的人绝不该错过的,那就是德里达或德曼争着为其做出注释和新解,甚至被后现代的所有理论家奉为鼻祖的本雅明。本雅明所做的事情恰恰与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翻译

理论家们所做的事情方向相反：《译者的任务》这篇长文（作为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译序，本雅明甚至没有把它发展为理论家们热衷的“专著”和“体系”，他的译序甚至和他的翻译实践毫无关系，这也就为后世对于《译者的任务》的无穷多解奠定下了基础）几乎囊括了翻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然而其哲学性的出发点却是根本的，那就是，翻译究竟是什么。翻译其他所有基本问题也都是被纳入在这个本质问题之下的，所有的悖论以及所有试图挣脱出二元对立的努力以一种具象的、实际的方式提了出来。

如果说德里达不是本雅明在法国的继承人，安托万·贝尔曼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同为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并且精通德语），贝尔曼延续了本雅明在翻译领域的思考。然而和本雅明相比——因为前者更是一个哲学家和文论家——在我看来，他所做的的是一个真正的翻译理论家所应做的事情：围绕翻译本身，建构起有关翻译的一个“问题”体系，从翻译史（而不是史料）入手，对翻译史、翻译本质与翻译批评的问题进行论述。贝尔曼的方法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和论证之中逐渐浮出水面的，直至我们最后触及其方法的灵魂。在他的理论陈述中，我们从不曾见到用一个死的方法框架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规定翻译现象和事实的过程。

四

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开设这门课程以及撰写相关的这本小册子时，我想，我应该首先从回到基本问题本身开始，是以翻译实践为

基础,但脱离了实践技巧层面的理论性基本问题;是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关系——为出发点的基本问题;是在语言和历史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基本问题。

我不否认自己在阐述翻译理论基本问题的途径上深受安托万·贝尔曼的影响。甚至在这本小册子中,如果我也算是使用了某些特有的理论语汇的话,其意义也基本在贝尔曼所框定的范围之内。有两个概念应当说完全取自贝尔曼:翻译主体与翻译伦理。^①

也许说到底,翻译的基本问题很简单:无非就是翻译的本质。或者,更进一步定义,是处在历史范围之内的翻译的本质问题。两个核心的悖论是围绕翻译的本质——亦即本雅明所谓的任务——展开的:不可译的悖论以及“忠实”的悖论。不可译的问题围绕当代语言哲学最为关注的“真理”问题,而“忠实”亦然。倘若我们不把世界看成是由一元带来的二元对立,我们就会给翻译、从而也给翻译理论研究一个足够的空间。

无论我们是从语言、认知、社会还是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的过程或是与翻译相关的各因素,被贝尔曼推到翻译理论研究前台的翻译主体是不应该遭到遗忘的。因为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碰撞并不是直接发生在目的语读者的身上,而是发生在翻译主体身上。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从语言、认知、社会还是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其根本的作用点都在于译者。是译者完成了语言、认知、社会、文化的行为,也

① 对于翻译伦理,国内翻译理论界至今仍然没有太多的涉及,但在贝尔曼的理论阐述中(自其早期的《翻译与文字或远处的旅店》开始直至其临终前的《翻译批评论》),却是他的一个核心概念。其他的理论家如亨利·梅肖尼克对此也有自己的阐述和见解。翻译伦理是针对翻译自身提出来的,并不存在一个超越翻译过程之外的道德场域对翻译进行规定的问题。

是译者使得同时具有如此多重性质的行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贝尔曼在其国际哲学院开设的长达数年的翻译研修班中曾经提到过，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有将翻译主体“抽象化”的现象——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理论本身的特点是相符的。

解释完我要说明的对象，最后还是要谈及方法问题。同样，我要向贝尔曼借用最后一对概念：**经验与思考**。贝尔曼用它来替代我们一向喜欢、却一直纠缠不清的另一对概念——**实践与理论**。在这本小册子中，鉴于词语本身的通用性，我仍然沿用了实践和理论，并在一开始就定义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而，这本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践无关。贝尔曼说，“翻译是能够在思考中绽放并被（重新）抓住的一种经验”，或者说，“从本质上说，翻译是一种作为经验的思考”^①。这应该很好地说明了我阐述文学翻译基本问题时的方法。无论如何，翻译是自身产生问题，并寻求思考的一种活动，这是贝尔曼的意思，也是我们在历经种种方法之后必然的回归。对于一个理论领域而言，如果方法是无法回归自身的，那它就不是从属于该理论领域的方法。也就是说，任何先于翻译经验（贝尔曼的意义）的理论框架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就是存在本身。

五

和所有活生生的存在一样，翻译是一种承受和痛苦，但也有无比

① Antoine Berman,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Seuil, 1999.

的欢愉；因为在翻译开启的空间中，我们永远都有创造美丽的梦想和可能。这应该就是我在绕过了一大圈之后，仍然要命定地回到——命定，是自己为自己规定命运——翻译的原因。

或许我不善逻辑，也不善构架，因而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是留下了在问题刚刚开始之时就已经存在的种种纠结。硬性的构架也许是一种妥协，和我在十年前做博士论文的经历是一样的。分解从最基本的因素开始，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主体和翻译的过程，这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所奠定下来的一个基本角度。

纠结就纠结吧，谁叫它就是存在本身呢。我们追问存在的本源，并非要铸就存在的单一模式，而是要以语言的方式重新经历存在。实际上，这是我在十年后的今天，重新进入翻译理论领域的原因，也是对自己在十几年前开始的工作做一个交待。

在本书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对于该书的框架问题以及书中所呈现的思考和表述的难点，从事日语语言文化研究的邹东来教授与我一直在不断地探讨和分析，本书的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中的部分章节是在他草拟的基础上最终修改定稿的。因而，这本书也是他的心血所成。

另外，我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感谢本书的编辑吴书勇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耐心和宽容，这本书大概永远也不能够面世。

袁筱一

2011年4月

目 录

不在场证明——代序	/ 001
导 论 何谓翻译理论	/ 001
一、翻译的本质及其所引发的悖论	/ 005
二、翻译理论研究的由来与发展	/ 013
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三个部分	/ 021
第一部分 “不可译”与翻译的可能性	/ 027
第一章 不可译：一个哲学问题	/ 029
一、问题的提出	/ 029
二、译者的任务	/ 034
三、翻译的语言哲学问题	/ 041
第二章 翻译史观对“不可译”作出的回答	/ 054
一、翻译所特有的时间性	/ 055
二、翻译实践中的不可译因素	/ 063
第三章 意义：不可译的悖论核心	/ 068
一、意义所走过的历程与翻译理论研究	/ 069
二、意义的单位与翻译的单位	/ 078
三、意义与忠实	/ 086
第二部分 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	/ 093
第四章 译者的位置	/ 097
一、翻译主体在两个文本中的位置	/ 099
二、译者在两种语言文化中的位置	/ 104

第五章	翻译主体的界定	/	111
一、	翻译主体的视域	/	112
二、	翻译主体的痕迹	/	123
三、	文学翻译中的复译现象	/	132
第六章	翻译主体的合理显现	/	138
一、	复制与创造的基本概念	/	138
二、	翻译作品的整体性	/	143
三、	“阐释不足”与“过度阐释”	/	158
第三部分	在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	/	165
第七章	翻译是一种平等的相遇吗?	/	170
一、	后殖民视域中的几个问题	/	170
二、	两种语言文化所构成的真实关系	/	176
第八章	抵抗与接受	/	189
一、	接受:文学翻译研究中必须考察的问题	/	189
二、	翻译对两种语言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	195
结 论	翻译理论研究的意义	/	203
一、	致力于自身所提出的问题	/	203
二、	关于翻译伦理的构建	/	210
三、	不是结语的结语: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	/	216
参考文献		/	219

导论 何谓翻译理论

不管翻译理论这个领域如何界定,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翻译几乎与语言的出现是同步的,并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几乎无法略去它的存在,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换句话说,翻译活动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已经无须任何证明。据冯·霍夫(Von Hoof)在《西方翻译简史》中追溯,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已经有译员存在^①。从完整的笔译角度而言,西方趋向于认为公元前三世纪揭开了翻译史上的伟大一页:即由 72 名犹太学者用希腊文所译出的最早的圣经版本《七十子希腊文本》以及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用拉丁语所译出的荷马史诗《奥德赛》。^②而在中国,相传在远古时期也已有类似于口译性质的人员存在,方便不同语言之间的人进行沟通。^③

然而翻译的古老性与重要性似乎无助于其地位的提高。一方面,尽管翻译实践活动由来已久,它却似乎不能自发地产生独立的系统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跳出翻译史之外,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语言史、文学史与艺术史对于翻译一向另眼相看,或者,更确切地说,翻译一向不

① Henri Van Hoof, *Petite histoire de la traduction en Occident*, Cabbay Louvain-la-Neuve, 1986, p. 5.

② 参见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 页。

③ 参见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翻译论集》序,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 页。